

135713

井本館
日誌

反右派通訊選輯



510
/3187257

湖北人民出版社

510

反右派通訊選輯

•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1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3 $\frac{9}{16}$ 印張·81,000字

1957年10月第 1 版

1957年11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6,001—17,000

統一書號：T 3105·52

編者的話

大鳴大放期間，武汉地区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幫助黨整風為名，到處放火，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制度、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了一場惡毒的進攻。在武汉地區黨委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機關團體，和大专院校的廣大群眾，對這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魎展開了堅決的反擊。經過揭發事實說理辯論的群眾鬥爭，右派分子一個一個地被揪出來了。目前武汉地區的反右派鬥爭正向縱深發展，並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這對於所有知識分子來說，是有深刻教育意義的。為了便於記取這一鬥爭的經驗教訓，我們特從報刊上剪輯一些寫法相近的有关通訊予以出版，有的經過作者作了較大的修改；雖然這些通訊所紀錄的，遠不是武汉地區反右派鬥爭的全部，也不一定就是寫得最好的。

編者1957年10月5日

目 录

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馬哲民	1
一个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鋒	7
——揭开右派分子耿伯釗的假面具	
揭穿彭一湖的真面目	13
他們这样“帮助”党整风	20
——武汉大学在“鳴”“放”中的一些謬論	
“右派司令”吳开斌	30
韦、黃家族集团在华师的复辟勾当	36
揭开謎底	43
——中南財經学院的“联合宣言”真相大白	
階級斗争的火焰	49
——华中工学院以會文三等为首的反党集团活动紀实	
“反官僚爭同济”是怎么一回事?	56
武昌商业学校里的风波	62
——反动分子陈恕是怎样制造学生鬧事事件的	
李蕤——披着作家外衣的个人野心家	68
姚雪垠的反党面目毕露	88
反党的“通才”	96
——記长江日报反党联盟的首腦楊江柱	
江云反党集团土崩瓦解紀实	104

章罗联盟駐武汉专員——馬哲民

一貫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民盟湖北省主委、中南財經学院院长馬哲民，这些天来，在广大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下，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一个披着馬列主义外衣、站在资产阶级立場、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

他派人四出点火，要盟員“揭开党的黑幕”，
“把象鼻子說成竹筒都可以”

整风运动初期，馬哲民对光明日报記者說：要想真正鳴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讓大家“吐苦水”、“发牢騷”，这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縛。他还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把人們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为此，他首先派遣民盟省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到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去点火。在一次武汉市盟員大会上，馬哲民甚至說：“这次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說，比如把象鼻子說成竹筒都可以。”馬哲民的亲信陆鳴秋，并冒用中共湖北省委統战部的名义，秘密地到华中工学院去点火。

当馬哲民派人到华中师范学院去搜集“肃反”和“工資改革”資料时，华师盟支部的一些干部不贊成背着学院党委来搜集材料。于是，他們便撇开这些靠攏党的盟員，自己动起手来。并再次派陆鳴秋到这个支部，号召全体盟員：“不要講什么观点立場，要揭开党的黑幕。”5月下旬，民盟湖北省委的右派分子，

并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了一个由武汉师专教师参加的“黑会”，会后并派張云堯、李秋山到各校去推动組織这次“黑会”的經驗。

馬哲民还叫省民盟委員到各县去搜集工人、农民对党的意見；并要大家注意青年学生的活动。他說：“只有这些人动起来，才能‘鳴放’得起来……工人、学生起来，力量就大得很。”

他煽动学生到北京請愿。他說：“首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簡直是放狗屁”

身为中南財經学院院长长的馬哲民，抓住了青年学生年紀輕、缺乏經驗的弱点，明目張胆地煽动他們，企图利用他們作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儼然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者，出席同學們的大、小會議，天天接見学生代表。当少数同学提出“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工資待遇低”的意見之后，馬哲民便趁机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說，認為，这些意見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也沒有夸大事实”，他“完全支持”。他說：“中南財經学院問題太多，正处在紧急关头，大家提出这些意見是挽救了財院。”他还說：“过去我們的教學工作總結中，首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現在看起来簡直是放狗屁。”接着他煽动同学說：“你們的問題，学校能够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請示高教部；如果高教部解决不了，那么为了不貽誤你們的青春，你們要求离开財院、轉院我也同意；只要你們的問題解决了，我这个院长不当也可以。”

有些同学听了馬哲民这一席話之后，很泄气。只想關轉院。这时，馬哲民又一再向同學們表示，他“十分同情”青年人的“苦楚”，并說：“准备把同學們的意見轉給高教部，請他們派人来解决。如果他們不來人，我們就派代表团上北京。”在馬哲民的煽动下，同學們立即組織了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出发前，馬哲民

又火上加油地說：“你們去鬧，沒問題。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要將他一軍。”

馬哲民并惡毒地誣蔑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煽动学生对党不滿。他对农业經濟系的同學說：“你們的培养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是科长、場长等管理干部。但是，这些位子都被老干部占了。这些人业务不高，但都一定得当领导，除了领导之外，其他工作他們不能做。”他还說，目前党和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之間的矛盾，超越了党与高級知識分子的矛盾。他企图煽动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与党鬧对立，动摇党的基础，从而把党搞垮。

他教唆以往擁護党的教授，要以“党所好惡之，党所惡好之”的态度“帮助党整风”

馬哲民煽动中南財經学院的教师們与党鬧对立。他积极鼓动过去在“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人“尽量吐苦水”。他对过去靠攏党的教授說：“你們这些人，平时是帮助党筑了牆的，总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惡惡之”，因此，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要“逆以往之道而行”。也就是采取“党所好惡之，党所惡好之”的态度。李光維教授曾反駁他說：“党所惡的是人民的敌人，难道也要我去好嗎？”

王祥麟教授（民盟支部主委）說：“有一次馬院长对我說，黨員干部是法西斯作风；‘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是教条。他想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自己却不說，而要我去提。我說，学校不要党委领导恐怕不对头。他立即板起面孔說：是你的思想沒搞通；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說服党內的頑固派。”

他散布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謠言，要求盟員 多提意見，“說服”黨員退出学校

馬哲民捏造事實誣蔑黨，把工作中的部分缺點擴大為全部；把個別黨員的錯誤，擴大為全黨的錯誤，企圖以此達到削弱黨的領導的目的。華中師範學院邵子風教授說：“有一次，在盟武漢市委常委會上，馬哲民公開說：老干部是‘堅持三大主義（指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熟讀四子書（抓辮子、扣帽子、擺架子、要面子）’；說‘老黨員都是經驗主義，新黨員是教條主義’，應付不解放後的複雜局面。”去年，馬哲民以全國人民代表的身份，從四川視察回來，向中南財經學院教授王祥麟等說：“四川某大學有一個教授對我說：共產黨員是一些木頭人，思想簡單。這位教授不願入黨，不願與這些木頭人為伍。”

在一次民盟省委召開的“高校黨委制座談會”上，馬哲民派陸鳴秋代他宣布說：“中央已決定改變高校黨委制，只有少數黨員不肯退出，因此希望到會者對黨委制多提些意見，盡量揭露缺點，以便說服那些黨員。”經過討論，除了有兩三個人附有條件的贊成取消黨委制外，大多數到會者都反對取消黨委制。然而，馬哲民仍然說：“黨委制越來越阻礙了高等學校的發展。”在總結時，他故意歪曲與會者的意見，說大家認為“黨委制不能存在”。

早在去年夏天，他就開始推銷章伯鈞“兩院制”的主張

馬哲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是有明確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作指導的。6月12日，馬哲民對中南財經學院的教職員作報告時說：“今後人民內部的差別，是同一前進目標下的進步快、慢之分，沒有多大差別了。因此，我們不能把階級觀

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他极力攻击人民民主政权的組織形式——民主集中制；积极支持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要搞資产階級民主、搞“兩院制”。他說：“政协初期是一个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就改变了。有人提出：政协应该对政府有监督权、应成为上議院的性質。我主張这样提。”（馬哲民1956年8月在廬山松門別墅的报告）他还說：“政协可能改为相当于資本主义国家上議院形式；人民代表会可能改成相当于下議院的形式。如此，就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固定下来了。民主党派要自信起来，我們也要万岁了。”（1956年7月14日在民盟武汉市委基层干部座談会上报告）

于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馬哲民便指示武汉地区各大专科学校中的民盟支部积极扩大組織。他說：“民盟是知識分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一只渡船。”馬哲民并派专职干部陈中正，到华中农学院去指示：“盟組織活动，可不必和党商量。”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与党分庭抗礼，馬哲民极力主張民盟在武汉市创办报纸，以扩大盟的影响。

他誣蔑“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論是教条主义，公开为章伯鈞、儲安平等辯护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論，对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猛烈回击的时候，馬哲民仗着平时伪装进步的假面具和两面派手法进行頑抗。他誣蔑“人民日报”社論是教条主义残余；說“人民日报”指出右派分子进行階級斗争不对。同时，公开为章伯鈞、儲安平、陈新桂等人的反动言論辯护說：“他們的观点是錯誤的，是不是立場問題，还不敢做結論。”他还說：“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点資产階級民主。”他認為章乃器是落后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进步。

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叛徒，先叛党，又叛盟，至今还埋怨蒋介石不争气。

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不是偶然产生的。馬哲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日本鬼混过两年回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1926年，北伐軍胜利到达武汉后，馬哲民回国。大革命失败后，馬哲民貪生怕死，不服从党所分配的工作，偷偷摸摸地带着眷屬跑到上海，加入了汪精卫等組織的中国国民党“改組派”，宣布“要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馬哲民在成都。当蔣管区民主运动高涨时期，他以进步面貌跑到重庆，参加了民主同盟。但是，由于他貪生怕死，他在重庆被捕后，馬上搖尾乞怜于張篤倫（伪重庆市长），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为此，民盟中央要开除他的盟籍。因为章伯鈞竭力帮忙，才馬馬虎虎攔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張篤倫任伪湖北省主席，馬哲民又連忙跟他赶到湖北，通过張的关系，到湖北农学院当教授。馬哲民在解放后每每回忆起反动派对他的恩惠时，不由得牢騷滿腹，逢人便說：“蒋介石不好好地搞，不争气。”从这里即可了解到：馬哲民为什么要反共、反社会主义了。

（原載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

一个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

——揭开右派分子耿伯钊的假面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什么人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向党进攻最凶呢？看看耿伯钊的材料可以完满答复这个问题。

耿伯钊仇恨共产党切齿入骨

耿伯钊是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北省副主席、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他自己则喜欢以“辛亥革命老人”自居。自从解放以来，在各种公开场合，耿伯钊用尽了动听的词句来说明自己是如何“拥护共产党”、“赞成社会主义”。但是，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他就大露头角了。一个月以前，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反对所谓共产党的大党主义；他说，“这次提出的整风运动，据我的体会，也就是反对大党主义，不要党员人人以领导者自居，盛气凌人。建议毛主席把这話明确起来，这对党的威信有益无损”。

耿伯钊的所谓“大党主义”谬论，其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否认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争夺领导权。为了强调所谓“大党主义”，耿伯钊故意歪曲事实，把民主党派说成是“眉毛”，可有可无，发挥不了作用。也是在那次发言中，耿伯钊向共产党提出了10条建议，在这些含着毒素的建议中，耿伯钊“劝告”“党的领导同志要堵塞阿諛、逢

迎之門，黨員要从思想上根本鏟除特權思想和行為，不要騎在人民頭上”等等。在他的眼裡，凡是靠攏共產黨的都是阿諛逢迎。把共產黨員描寫成烏合之眾。

耿伯釗仇恨共產黨切齒入骨。他輕蔑地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什麼特殊材料？還不是他們父母交合的血液製成的。”他說，共產黨員只不過是一群給人們帶來災禍的“蝗蟲”。耿伯釗把統戰部形容成是“監督民主人士的民主黨派管理部”，是“親小人，遠賢臣”的地方；凡是接近統戰部、靠攏黨的，他就謂之“小人”、“耳目”。他曾毫不隱諱地公開散布這樣的言論：“民主人士要有自尊心，不要靠攏共產黨”，他認為與中共統戰部接近的都是一些“卑鄙醜惡的壞蛋”。

耿伯釗挑撥人民群眾與黨的關係的方法更為惡毒，湖北省參事室研究員高元承揭露了耿伯釗的有關反動謬論。耿伯釗說過，“中國有六億人口，共產黨員只有一千多萬，分開打一架，看誰打得過誰”？這個拿着人民薪金而惡毒地誣蔑攻擊共產黨領導的“辛亥革命老人，”為什麼這樣刻骨痛恨共產黨呢？他有自己的道理。

耿伯釗對反革命罪魁的“恩情”戀戀不忘

耿伯釗是蔣介石的忠實信徒，他對蔣介石、白崇禧、何成浚這些反革命罪魁的“恩情”，至今戀戀不忘，提起這些人民公敵來，至今他仍恭敬地稱為“蔣先生”、“白先生”。省參事室研究員高元承揭露他說：1954年我到參事室時，耿伯釗知道我是山西人，就興奮地對我說：“我和你們山西的閻錫山是老相識，我和他都是日本士官生，回國後，他到山西，我到湖北，他搞的還象個樣！”對一個統治了山西40年的土皇帝，耿伯釗就是這樣地備加贊美。

耿伯釗的反動思想在各個政治運動中都充分地表現了出來，他對各項政治運動，在公開場合都表示熱烈擁護，背地裏却用盡心計來破壞，誣蔑運動。在“五反”運動中，武漢市五毒俱全的大資本家賀衡夫受到了應得的制裁，全市人民對此莫不表示擁護，耿伯釗卻心懷不滿，以至過後別人談起有關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時，他還感慨系之地說：“在台灣比在大陸還好些。”土地改革時，耿伯釗盡力包庇國民黨大黨棍孔庚的兒子（此人現已被鎮壓），為農民訴苦的人被他說成是“拍共產黨的馬屁”，對於“三反”、“肅反”運動，表面上他都歌頌過，背後却惡毒地說，武漢市大資本家賀衡夫五毒罪行的證據都是假的，認為賀衡夫是受了冤枉。當人們正為肅反運動的成績拍手稱快時，耿伯釗卻露出了他凶狠的嘴臉：“等到台灣和平解放以後，連蔣介石也叫同志，現在又有什麼必要來肅反呢？”

耿伯釗希望蔣介石回來幹什麼？這點很有意思。耿伯釗說，他解放以來是含垢忍辱了五年。

耿伯釗含何垢，忍何辱

上面已經說過，解放以後，耿伯釗擔任了民革湖北省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等職位，他含了何垢，忍了何辱？原來是下面的這些事情：在參事室，耿伯釗雖然有職有權，5個副主任沒有一件事情不去請示他，但他認為自己是有職無權的傀儡；他自己有2棟房子，政府又另撥給他一棟房，他嫌屋裡沒有沙發，馬上給他送去沙發，可是他認為政府給他住的房子象倉庫；他每月的工資與房租收入在300元以上，喝的是好茶葉，吸的是高級煙，他却到處訴苦，說自己的生活是“上午炒鹽菜，下午鹽炒菜，吃豆腐是打牙祭”。最後還有一條，是解放後在廣大人民要求下，人

民政府依法鎮壓了他那當過大漢奸和國民黨軍統特務的儿子，他認為殺子之仇不能忘。

耿伯釗在解放後雖然得到人民的寬大、照顧，但他仍感到解放後含垢忍辱，是和他過去的生活比較而言的。解放前，耿伯釗是湖北省革命根據地安陸縣最大的惡霸地主，農民稱他為“土皇帝”、“太上皇”，全县28萬人口的生命財產完全操縱在他手裡，每次調換縣長必須經過耿伯釗的最後同意，他批准縣長的標準是：反共、反人民的積極分子。為了坐穩這個土皇帝，在安陸縣，他曾千方百計地破壞革命運動，企圖長期保持其地主政權。他驅使偽安陸縣縣長胡受謙殘害了幾百名革命志士，胡受謙在解放軍大軍南下時畏罪自殺，耿伯釗專為他召開追悼會，痛哭流涕地歌頌他“對黨國忠誠”，並且聲言要把他的“英勇事跡”呈報“胡長官”（胡宗南），為了替胡匪“報仇雪恥”，他又親率當時逃亡在武漢的地主、土匪、惡霸和劣紳到偽湖北省政府和武漢行轅請願，要求派飛機、匪軍、發錢糧彈藥支援繼任偽縣長孔欽勛回據安陸。這批耿伯釗的爪牙回安陸縣後說：我們如果再不好好的為胡縣長報仇，就對不起耿老。

解放後，他的土皇帝作不成了，他的土地被分了，漢奸特務儿子被鎮壓了。為了恢復他的土皇帝美夢，解放後耿伯釗心裡念念不忘蔣介石，行動中則仍然繼續充當劊子手喝采人，包庇反革命分子。曾經在安陸縣殺害革命同志幾十個人的縣國民黨部書記長廖尚質（監如），1950年潛進武漢市後，暗中組織地下軍，策謀反革命暴亂。耿伯釗對於這樣一個人民的罪人，多方設法加以包庇、隱瞞，幫助他找工作，指使他逃往外省。據安陸人民的檢舉，解放後，耿伯釗掩護了11個反革命分子逃亡海外，耿伯釗並要他們“努力為蔣介石的黨國效勞”。而在最近整風運動開始後，各處右派分子蠢起，耿伯釗高興極了，他

認為打倒共产党恢复“土皇帝”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党进攻的毒箭一支接着一支地射出来了。

耿伯釗的算盤完全打錯了

但是，耿伯釗这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把算盤打錯了，当他剛把自己的毒箭放出不久，馬上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击，人民憤怒地揭露了这个慣用两面手法哄騙人民的右派分子的历史真面貌。自居为“辛亥革命老人”的耿伯釗原来有着如下一段历史：1903年，他由秀才而中举，随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个“洋举人”回国后，就在清人果清阿手下，做了一名軍事故官，不久北伐軍起，他又混在黄克强部下当了几天參謀，这便是他“辛亥老人”銜头的由来。从1914年到1925年，他搖身一变而为北洋軍閥的爪牙，在北京作“京官”。这个政治上的不倒翁，从袁世凱潜窃总統以后，又改任陸軍部秘書长。自此，他便成了所謂“元老”、官僚軍閥的幕后人。当蔣介石背叛大革命，篡夺国权組織伪南京政府时，耿伯釗又登上了政府參軍长的高位，蔣介石做了伪总統，他也跟着高升为国大代表，在蔣介石60岁时，他写了一篇寿序，吹捧这个卖国辱民的强盜是“五千年来最偉大的人物”。解放后，他不得不假惺惺地投靠到人民政权这边，以便待机再起。

这就是右派分子耿伯釗为什么向共产党积极进攻的原因。他的丑恶行徑已激怒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广大人民，現正紛紛痛斥这个右派分子。最近召开的安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們一致要求向这个右派分子講理。但是耿伯釗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还躲躲閃閃，不肯对其他的右派活动进行很好的交代，一味支吾搪塞，避重就輕，把自己的反动言論归諸于修辞上的夸張，引起了人民的更大的憤怒，他們表示一定要和右派分子耿伯釗

战斗到底。他们警告耿伯钊不准蒙混过关，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只有如此，才是光明之途。

(原载1957年7月16日“长江日报”)

揭穿彭一湖的真面目

近来，有些人在叫“农民生活苦”。右派分子也抓住这个题目来做文章。昨天的地主阶级分子，今天也在为农民叫起屈来了。说来似乎奇怪，事情却也真有。在武汉的彭一湖，就是这样的人。

为了弄清楚彭一湖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究竟是代表什么人说话，记者最近特地到彭一湖的故乡——湖南岳阳黄田，作了一次访问和调查。

下面就是从彭一湖的家乡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从前彭一湖的佃户、债户、雇工等揭露出来的彭一湖的真正面目。

地主、债主、官僚

八年前，彭一湖还是黄田的地主老爷。

他曾经当过蒋介石反动政权下面的模范县长，靠剥削人民血汗的钱，在黄田这个山区占住了一百多亩肥沃的良田，成了当地最有势力的三大地主之一。

和其他地主一样，彭一湖的佃户遭受的地租剥削是很残酷的。贫农汤万城租了一年收谷十五、六担的土地，一年就要缴10担的租。这样，彭一湖一年收的租谷就有几百担，农民整年的辛勤劳动，只落得饥饿、呻吟，并且随时都有受到夺佃的危险。

彭一湖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大东家。